

1950年代，是中国大陆新旧变化的最初时期。此一时期的历史，可用“改造”一言以蔽之。本辑诸篇即是向人们展示这“地覆天翻”的改造景象和分析改造背后的深层缘由。

【第一辑】

中国当代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 / 编

专题研究

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

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

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年

“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

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

对比研究

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

征粮、民变与“匪乱”

史实讨论

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

外稿选译

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

“第一节课”

回忆与口述

沈善炯院士访谈录

许良英先生访谈录



1950年代，是中国大陆新旧变化的最初时期。此一时期的历史，可用“改造”一言以蔽之。本辑诸篇即是向人们展示这“地覆天翻”的改造景象和分析改造背后的深层缘由。

【第一辑】

中国当代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 / 编

专题研究

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

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

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年

“剥离”：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

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

对比研究

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

征粮、民变与“匪乱”

史实讨论

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

外稿选译

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

“第一节课”

回忆与口述

沈善炯院士访谈录

许良英先生访谈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史研究 /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9.4
(中国当代史研究文丛. 第1辑)
ISBN 978-7-5108-0043-6

I. 中… II. 华… III. 中国—现代史—研究 IV. 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3882号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

作 者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24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043-6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许纪霖	李丹慧	李海文
李蓓蓓	杨奎松	沈志华	陈 兼
林蕴晖	姜 进	徐思彦	萧冬连
董志凯	韩 钢	翟 强	

Elizabeth J. Perry

Paul G. Pickowicz

执行主编 韩 钢 徐思彦

卷首语

《中国当代史研究》是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以中国当代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连续出版物，暂拟每年出版两辑。举凡 1949 年以还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国防、外交、教育、科学、社会等历史问题，均属本出版物讨论范围。本出版物以还原和解读历史为宗旨，奉行学术自由、治学严谨、力求新知之原则，并以此为选稿的基本标准。本出版物设置专题研究、史实讨论、外稿选译、史料辑录、回忆和口述、书评书介等栏目，愿意成为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之学界同仁展示优秀成果的园地，竭诚欢迎各位研究者赐稿。

本书首辑的关注焦点在 1950 年代。1950 年代，是中国大陆新旧政权更替之后的最初时期。此一时期历史的基本特征，可用“改造”一言以蔽之。新政权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颠覆原有架构和体系，建立起迥异于以往之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确立了新意识形态的法定地位，并对社会实施改造，直至干预和渗透社会生活和国民心理。其“改造”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的，可谓“地覆天翻”。本辑诸篇论文即对新政权下的多方面改造，作了扎实的实证研究和深入探讨。

杨奎松的《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 1950 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从大区负责人的任用、各省市负责人的任用、县地级干部的任用、地下党干部的任用等四个方面，讨论了执政初期的中共干部政策。在这个时期，中共通过军事占领的办法，以选派“南下干部”全面掌管新占领区党政军民大权的措施，有效实现了政权的接管，而且建立了一个由上至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这一体制

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遍布广大新占领区，且处于各级权力中心地位的“南下干部”对中央政权的高度依赖，确立了中共中央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威权指挥地位。但它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对本地干部缺乏信任的现象，埋下了1950年代初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种子。

张济顺、张藜分别考察了私营报业和报人的改造、科学家在新政权之下的生存状况。张济顺的文章《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的考察》，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探讨了中共新政权对上海私营报业进行全面改造的过程。新政权是如何与一群文化人建立新认同的，上海的文化人和知识者又是如何应对文化体制急剧转型这场急风暴雨的变革的，他们如何经历了思想改造的被迫与自觉，如何适应私营到公私合营的体制变革以及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的身份转换？对此，文中有细腻的梳理。张藜的文章《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年——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以第一手文献、表格和日记、口述、回忆录，探讨了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科学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声望随着政治命运的改变所发生的变化，揭示出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

如果说二张的文章观照的是社会精英阶层，那么，王笛、阮清华则将研究触角伸向了社会底层。王、阮考察对象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关注城市“改造”问题。王文《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考察了1950~1956年间新政权在成都怎样利用改造曲艺演唱之地——书场，以提供“革命的大众娱乐”和建立“宣传教育的场所”，表明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是并行不悖的。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机器第一次真正深入人民日常娱乐生活的最基本的层面，并有力量改变其形式与内容，决定整个从事娱乐行业人们的生计、命运，控制人们从娱乐中所接受思想和价值观。阮文《“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则再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如何将旧上海臭名昭著的“游民窟”哈尔滨大楼变成专门用来改造上海无业游民的新人习艺的过程。

“对比研究”栏目，发表了王海光的《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和杰瑞米·布朗的《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年》的文章。两位学者探讨的都是中共初掌政权的

贵州，并揭示了一个共通的历史事实：随着贵州解放而来的仍有一段血与火的岁月，中共在建政初期经受了最初的执政考验。然而由于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其描述和观点均有所不同，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思考。

林蕴晖的《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考察了因如何认识土改以后农村开始出现贫富差距，以至个别富裕中农发展成富农的现实资本主义问题而在中共高层发生的争论，指出这场争论的结果，对尔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选译的两篇外稿，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的一篇《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通过私人信件、回忆录及其他文献，讲述了“火柴大王”刘鸿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新旧交替之时离开又最终选择共产党中国的过程。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的一篇《“第一节”——1950年代初期中国人类进化的教学》，通过1950年代初期“从猿到人”的通俗性宣传和教育，向国民灌输“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取代“唯心主义”，透视出新政权对意识形态功能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发挥到极致。文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国民心理的。

“回忆与口述”栏目的两篇访谈录，受访者均来自中国科学院，一位是沈善炯院士，一位是许良英先生。两位先生对在中国科学院经历的口述，与张藜的文章相得益彰。读者若能将三篇文章对照阅读，想必会对新政权下的知识分子境遇和心理获得来自亲历实感和文本研究的双重印象。

编者

2009年4月

目 录

卷首语

专题研究

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

——兼谈 1950 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 \ 杨奎松 3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

——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的考察 \ 张济顺 40

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

——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 \ 王 笛 76

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 年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 \ 张 藜 106

“割瘤”：1950 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

——以哈尔滨大楼的清理为例 \ 阮清华 143

1950 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 \ 刘 统 156

对比研究

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

——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 年 \ 杰瑞米·布朗 177

征粮、民变与“匪乱”

——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 \ 王海光 201

史实讨论

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林蕴晖 237

外稿选译

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

——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高家龙 263

“第一节课”

——1950年代初期中国人类进化的教学\舒喜乐 285

回忆与口述

沈善炯院士访谈录

——《我的科学生涯》补遗\熊卫民访问整理 311

许良英先生访谈录\樊洪业 王德禄 尉红宁访问 尉红宁整理 323

史料辑录

朝鲜战争文献·志愿军战士家书往来\343

书评书介

季羨林：《我这一生》\邱路 359

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6-1968）》\邱路 362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邱路 365

谢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邱路 368

曹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邱路 371

专题研究

DANGDAIZHONGGUOSHISHIYANJIU
DANGDAIZHONGGUOSHISHIYANJIU

当代中国史研究

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

——兼谈 1950 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

杨奎松^①

摘要：建国初期，中共通过军事占领的办法，以选派“南下干部”全面掌管新占领区党政军民大权的措施，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政权的接管，而且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全面建构起一个由上至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这一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遍布广大新占领区，且处于各级权力中心地位的“南下干部”对中央政权的高度依赖，确立中共中央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威权指挥地位。但它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对本地干部缺乏信任的情况，埋下了 1950 年代初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种子。

关键词：接管 干部政策 南下干部 地下党 “地方主义”

1927~1928 年，国民党单独完成北伐建立了全国统一政权时，曾经面临过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以国民党当时 22 万普通党员，约等于全国人口 1:1820 的比例数，^②要想实现其“以党治国”的目标，可谓难乎其难。为解决执政困难，国民党在事实上大量借助和利用了旧人员（如旧官僚、旧军阀和地方士绅）来达成执政的目标。最为典型的是，1928 年国民党宣告北伐大功告成时，其四大集团军，除了蒋介石

^①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② 转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 249 页。作者按：1928 年时通过集体宣誓登记方式入党的军队党员还有数十万，但因其名无实，故未统计在内。

南京中央政府统辖的第一集团军以外，另外三支集团军，均为地方军阀势力。^①结果，北伐战争刚刚结束，这几支不同派系军队相互间就再度爆发了大规模内战。这种时断时续的内战虽然没有根本破坏南京政府的一统天下的地位，但是，接纳和依赖于这些旧势力执政的后果，却明显地消解了国民党此前各种平民化的社会变革诉求，导致了国民党及其政权性质的根本性改变。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之际，看上去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危险。尽管，1949年的中共党员人数多达450万，^②与当时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20，远比国民党1928年时强得多。但是，第一，其党员人数上的这种优势，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西北及华东的一些根据地和军队里面，在广大新占领区域，党员人数还是十分有限。而且，凡是没有经历过整风学习、土改运动和战争考验，尤其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大批新区的党员干部，中共中央也难寄予信任，这更局限了可用党员的数量。第二，中共中央建国伊始，也一样面临到国民党1928年统一中国时所面临的十分相似的问题，即四大野战军及其各根据地“诸侯”所形成的“五雄七霸”的局面。^③刚刚从农村中走出来，对以城市为中心确立各级政权还毫无经验的中共中央，既必须要依靠各路“诸侯”打天下、坐天下，又不能对“山头主义”掉以轻心，以至养虎遗患，其策略分寸把握之难，亦可想而知。

迄今为止，我们从已有的研究中看到最多的涉及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干部任用政策问题的研究，只有1952年和1957年发生在广东地区的反“地方主义”事件。^④但是，究竟这一事件由何而来，广东本来就具有特殊性，中共中央何以进据广东之后仍旧大量任用广东籍干部在广东各级政权中担纲挂帅，最终造成所谓“地方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在全国建政初期，究竟有着怎样的干部任用政策和策略？这种政策和策略形成的背景、原因及其效用如何？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还没有系统的考察和研究的成果。本文不准备讨论中共建国初“地方主义”形成和反“地方主义”事件的经过情形，只想尝试着从中共干部任用政策和策略的角度，来考察中共干部政策的本质及其他同反“地方主义”情绪的各种内在逻辑联系。

① 即以西北军为基础的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晋军为基础的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和以桂系为基础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

②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0年5月21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

③ 参见《陈毅1954年2月23日在饶漱石同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和饶漱石1954年3月27日的《检讨报告》。两人均提到建国初期党内所存在的这种现象。

④ 比较全面地探讨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经过的著作，首推古大存秘书杨立所著《带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较系统地谈论这一话题的论文，则以朱健国的《广东为何反“地方主义”？》（朱健国搜狐博客，<http://zaojl.blog.sohu.com/820301.html>。）为代表。

关于大区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中共中央是从1948年秋天才开始面对统一各根据地军事力量问题的。毛泽东在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讲：仗打到现在，出现了正规化的问题，编制要统一起来了。但当时毛估计还要5年时间才能打败国民党，因此，统一编制的问题还显得不十分急迫。他甚至还担心，过早统一，后勤补给仍旧各补各的，正规化不仅实现不了，还会造成很多麻烦。^①

但进入1948年11月，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明确提出：“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达成”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②为此，经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日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第一次提出了整编全国军队的要求。《规定》将全军各地的部队按地域划分为四大野战军，即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其中，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③

进入1949年1月，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队损失殆尽，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前以地域命名的野战军番号已不合时宜。故1月15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④将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仍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两个兵团共6个军；将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仍以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3个兵团共10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将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仍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

① 故毛这时主张还只能逐渐正规化，说过早正规化也会犯错误。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9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

② 《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告东北局及各局、各前委负责同志的电报》，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94页。

③ 《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8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6~451页。

④ 《中央军委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1949年1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九、十4个兵团共16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及华东海军，将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仍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4个兵团共12个军，另加1个特种兵司令部、1个铁道兵司令部及两广纵队。另将原华北军区的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作为直属军委统帅的战略机动部队，下辖第十八、十九、二十3个兵团共11个军，后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一野是由抗战时期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主力部队，逐步发展而来的，主要活动在陕、甘、晋几省区。一野组建后，在彭德怀将领的指挥下，亦主要担负攻略西北各省的任务。历经各大战役后，一野于1949年夏秋，先后攻取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

二野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曾参与淮海战役。二野组建后，在刘伯承、陈赓将领的指挥下，在实施渡江作战，占领南京后，主要负责攻略西南各省，历经各次战役，至1949年底，在一野贺龙所率一部配合下，已经完全占领了四川、西康、贵州、云南等省。

三野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一直活动在华东各省，是淮海战役的主力部队。三野组建后，在陈毅、粟裕等将领的指挥下，主要负责攻略东南沿海诸省。历经各大战役，于1949年秋完成了占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各省市的任务。

四野是抗战胜利后以奔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队，曾成功举行过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四野组建后，在林彪等将领的率领下，于1949年春渡江后，主要负责攻略中南及华南数省。至1949年12月已成功夺取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各省，并于1950年4月攻占了海南岛。

四大野战军，虽在1950年作战任务完成后，先后被取消了番号，但所属部队及其主要将领仍按所占地域分别安排辖地。如一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即并入西北军区，彭德怀为西北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二野番号取消后，组成西南军区，刘伯承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三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四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归中南军区指挥，林彪为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连同先后成立的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东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的华北军区，新中国建国后设立的六大军区，事实上仍是迁就原有地方军事系统而设立的。不仅如此，

中共中央部署作战及安排各大军区统帅人物时，还特别注意考虑负责将领对新占领区的熟悉程度问题，有意按照籍贯及工作经历等要素分派占领任务。比如刘伯承、邓小平所率二野 1949 年渡江南下时最初的任务是在华东方向，但考虑到二人的川籍背景，中共中央很快即在部署下一步南下作战任务时，将已经占据南京地区的二野，越过已经占据武汉的四野，调去西南方向。从这一点更可看出，中共中央这时任用高层干部的首要条件，就是着眼于能否有助于实现有效占领和建立巩固政权。因此，它一反中国传统的职官任用模式，“举贤不避亲”，越是自己亲近了解的，越是熟悉所任地方情况的干部，就越是要用。^①

有关这种部署与安排的内在关联性，可参见表 1。

表 1 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籍贯、经历及与属地关系

序号	军区负责人名衔	军区名称	辖地范围	籍贯	与辖地关系	党政兼职	备注
1	彭德怀司令员	西北军区	陕、甘、宁、青、新	湖南	长期在陕甘作战	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苏区干部
2	习仲勋政委	西北军区	同上	陕西	本地人	原为第三书记，1950 年初任第二书记	苏区干部
3	林彪司令员	中南军区	豫、鄂、湘、粤、桂、琼	湖北	本地人	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苏区干部
4	罗荣桓政委	中南军区	同上	湖南	本地人	中南局第二书记	苏区干部
5	陈毅司令员	华东军区	鲁、苏、浙、皖、赣、闽、沪	四川	长期在华东各省作战	华东局第二书记	苏区干部
6	饶漱石政委	华东军区	同上	江西	本地人并长期在华东工作	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白区干部
7	刘伯承司令员	西南军区	川、黔、滇、康、渝	四川(今属重庆)	本地人	西南局第二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苏区干部

① 不用本地人做本地官，即任官要“避籍”，明清都有明确规定。明朝有“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规矩，清朝有异地 500 里为官的要求。

表 1 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籍贯、经历及与属地关系（续表）

8	邓小平 政委	西南军区	同上	四川	本地人	西南局第一 书记	苏区干部
9	聂荣臻 司令员	华北军区	京、津、冀、 豫、晋、内蒙 古	四川 (今属 重庆)	长期在晋冀 几省作战	华北局第二 书记	苏区干部
10	薄一波 政委	华北军区	同上	山西	本地人	华北局第一 书记	白区干部
11	高岗 司令员 兼政委	华北军区	黑、吉、辽等	陕西	抗战后即 在东北工 作	东北局第一 书记兼东北 人民政府主 席	苏区干部

由表 1 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六大区 11 位主要负责人当中，仅本地人就用了 6 位，其他 4 位非本地人中，只有高岗在当地工作生活时间为几年，其他如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都在当地工作生活了十多年之久。

对建国初的地方军政机构设置，中共中央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于各大根据地和各大野战军，亦即各大山头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①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时实行了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除华北人民政府并入中央外，其他五个大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②但基于党高于一切的原则，各大区实行的是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尽管，毛泽东建议，军政委员会主席应由所在地大军区司令员来担任，^③但党的书记在这里仍旧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在六大区里，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即党政军一把手一肩挑的，有三位。如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都由林彪一人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都由高岗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都由彭德怀担任。其他如华东、西南，也基本上是党政军一体。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为饶漱石，陈毅为军区司令员；西

① 这种情况在中共七大时即有过。高岗讲：“‘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转见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② 东北和华北因情况特殊，故先行成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但区划原则相同。

③ 如《毛泽东关于中原局书记人选等问题给刘少奇等同志的信》，1948年12月12日，转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2页；并见前引陈毅、饶漱石的发言与检讨。